

曲阜文史

目 录

1982年12月第二辑

访周林同志纪实	胡远 姚开亮	1
回忆第一次解放曲阜的攻城战	蒋仰乔	7
第一次解放曲阜的点滴回忆	董鸣春口述 孔祥民整理	9
回忆我少年时和孔德成在一起	张培英口述 张河整理	11
跟随孔德成先生在南京	马贵法口述 张河整理	13
曲阜师范简史	高文浩	15
二师校长、民族英雄张郁光事略	高文浩	20
县立师范讲习所	朱时雨 孔庆殿	23
孔、颜、曾、孟四氏学	张富祥	25
孔子的先世	张富祥、梁方健、姚华	31
孔子出生地尼山及其建筑群	郭克煜	36
曲阜一带孔子从事教学活动的遗址	骆承烈	40
曲阜楷雕简史	骆承烈 颜景新	45
大庄绢花与腊八花店	官雨声 孔祥民	51
龚氏扶兴和笔庄	作民	53
大庄琉璃瓦小史	郭克煜 梁华	55
尼山砚	《曲阜》	57
曲阜的照相业	孔祥民	58
本辑照片	侯新建 孟霞 半影	
本辑篆刻	颜景新	
本辑尾花：孔庙珍藏汉画像石刻		

访周林同志纪实

胡远 姚开亮

周林同志，历任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曲阜工委书记，曲泗县委宣传部长，鲁南尼山军分区武工队长兼指导员，邹县县委敌工部长，鲁南七十二团政治委员，曲泗县委书记，曲阜县委书记，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七十二师筹粮委员会主任，浙江省杭县县委书记，绍兴地委宣传部长，浙江医学院党委书记，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浙江省委党校校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杭州大学党委第一书记，金华地委副书记，浙江省广播事业管理局领导小组组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等职。

为了采写我县有关史料，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我们在杭州访问了周林同志。他，高高的身量，面貌清秀，虽已年近古稀，但步履敏健，精神矍铄，讲起话来，清晰洪亮，条理分明。周林同志告诉我们——

我家在泗水县岳家岭。六岁开始读私塾。十六岁进曲阜城里两级小学读书，那时称“昌平书院”。小学毕业后，考入了省立泰安第三初级中学。初中毕业后，一九三六年九月考入济南山东省高级农业职业学校。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鬼子打到德州，学校被迫解散，我便从济南回到家乡泗水。

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整个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畏敌如虎，望风而逃。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拯救民族危亡，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我作为青年学生，面对严酷的现实，正义感和民族自尊心促使我极端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极其愤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无比钦佩中国共产党人勇赴国难的英雄气概。回到家乡后，便和弟弟周亚民（原名周传恺，当时是泰安中学的学生），积极寻找共产党。一九三八年五月，由泗水县孟家村的党员王玉林（原名孔昭森），介绍我和弟弟亚民一道参加了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在党的领导下，宣传抗日救国。一九三八年十月，经乔海秋（原名乔尚涵）、王玉林同志介绍，我又和弟弟亚民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了革命，走上了抗日救国的大道。

那时，泗水县委已经建立，县委书记是孙汉卿同志。县内一些老党员周兰田、江虹、朱旭、张旭等同志也已经开始了抗日救亡活动和发展党的工作。三九年，泗水县委撤销，建立了泰泗宁（也叫曲泗宁、泰宁曲泗）中心县委，县委书记江虹（原名叫钱杰东），是泗水县颜庙庄人。宣传部长是孔小龙，他参加革命后改名张昭，一九四〇年脱党。组织部长是张旭，独立营长钟兰坡。我是曲泗边区区委书记。当时，党组织给我的任务是：由泗水向

西发展，打通沂蒙山区到津浦铁路的这条交通线。我边工作边发展党员。我发展的党员有：曲阜横沟泉的孔宪池，也叫孔华民，现任杭州炼油厂驻宁波办事处主任；辛庄的官玉山，后来脱党；还有开中药铺的官振霖；蔡庄的孔宪维（他革命后改名孔子纲，现任杭州市纺织局局长）和孔宪典、孔宪绪、孔宪章，孙家道沟的孙文明，刘庄的刘玉文等。那时，在曲阜城里活动的已有张经、张文式、狄井芴、孟宜、孔德潜、冯克玉等。在董庄活动的有杜牧（原名叫孔令为，现任枣庄市委副书记）、张瑞（原名叫孔繁芝，现任辽宁大学党委纪委副书记）、马斌（现任武汉体院副院长），衡庙的屈平，是伪区长屈崇森的儿子，韦家寨的何生（原名叫翟盛凯），后来叛了党，苏鹏（原名翟鹏飞），焦沟的聂桂田，高家楼的翟厚仁，乱石崖的张秀冬，是个中医，已经牺牲了，还有马宇光，原名叫闻祥同，韦家寨的翟士正等。

当时，泰泗曲宁中心县委归泰安特委领导，特委书记夏辅仁。一九四〇年春，泰宁曲泗县委撤销，成立了泰宁县委、泗水县委和曲阜工委。那时，这三个县划归鲁南一地委领导，地委书记许岩，泰宁县委书记武效周，泗水县委书记乔海秋，曲阜工委书记是我。工委组织部长翟士正，后来换了聂桂田；宣传部长翟厚仁，后来翟厚仁去党校学习，就换了周亚民。

曲阜工委，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整顿曲阜境内、津浦铁路沿线的党组织。因为，一九三九年，曲阜北部及津浦铁路沿线的地下党员，公开拉起了一个抗日武装，名叫“三中队”，有七八十人，他们沿津浦铁路活动。当时日本鬼子和汉奸为了对付这支武装，采用了最残酷的手段，拘禁、杀害他们的家属。由于当时思想工作薄弱，这支队伍就散了，有的远走高飞，参加了八路军主力部队；有的跑回家不干了；有的投敌当了汉奸。新成立的曲阜工委，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负责找这些人进行教育，摸清思想动向。革命意志坚定的动员出来，到根据地去；没有暴露身份的，继续隐蔽进行工作；动摇的，投敌的就切断联系，消除隐患。另外，通过有公开身份作掩护的党员，为当地我党公开活动的抗日武装蒙南支队一大队（朱旭同志任教导员）和泗水县大队（大队长徐法斌）搜集情报，提供对敌斗争的线索。

曲阜工委的领导分工是：我抓全盘工作，组织部长聂桂田同志负责董庄、焦沟、杨家庄一带，宣传部长周亚民同志负责横沟泉，南陶洛、辛庄、蔡庄、岳家岭及仓上一带。共有十几个支部，几十名党员。曲阜工委活动到一九四一年七月，与泗水县委合并，成立了曲泗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乔海秋，组织部长冯克玉，原名叫冯占青，是曲阜南门里人，宣传部长是我，民运部长王玉林，独立营长徐法斌，教导员赵炎。那时，曲阜部分的工作由周亚民同志负责。一九四二年十月底，冯克玉同志在东和尚庄一带负伤，县委研究决定，要我送他去邹东根据地治疗。因为，从泗北到泗南、邹东，经过的敌占区，沿路党的组织我熟悉，泗水伪军六中队队长孔昭殿和我党有关系，他不打我们，出现意外情况可以应付。到地委向杨士法同志汇报后，送冯克玉同志去尼山军分区医院治疗。我便留在了地委，十二月到了尼山军分区武工队。

从一九四二年到四三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敌伪一方面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围剿和封锁，一方面加紧对敌占区的控制。那时，铁路沿线村村成立了“爱护村”，实行连甲带保，残酷迫害抗日家属。在曲阜的日本特务头子唐本组织了专门对付我党的“三分军

事，七分政治”的“曲泗工作队”，联合泗水的特务、汉奸，对付曲泗党的组织。一九四二年春，负责曲阜部分工作的周亚民同志被在泗水的日本特务中山和汉奸乔修典抓捕。但，在押送兖州的途中，正逢曲阜南关集，他跳车逃回了泗北。接着，我母亲、婶母（亚民母），聂桂田的母亲、妹妹，都被日本宪兵队抓进了兖州监狱。一九四二年底，曲泗县第二任县委书记夏枫被捕，这时曲泗县委的班子瘫痪了。四二年底，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振民，原名叫宁鸿鹤，到尼山地委向书记杨士法同志汇报了曲泗县委的情况。地委决定、经鲁南区党委批准，曲泗县泗南、泗东部分划归邹东，由尼山地委直接领导；曲阜、泗水北部划归鲁中泰宁县委领导。李振民同志调任泰宁县委宣传部，当副部长。徐法庚、于蔚祥因都是泗北的党员干部，也随李回曲北、泗北。我没能再回曲泗，留在了邹东，任尼山军分区武工队长兼指导员。一九四三年六月，鲁南主力三团打开后五村，在曲泗邹边界地区建立了一个鲁山区，由尼山地委领导，我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当时，泗水戈山厂属于这个区，上下五个戈山厂，都是孔府的佃户，群众觉悟比较高，工作开展较快。组建民兵不久，就配合三连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活捉了一个姓韩的翻译官，粉碎了敌人的抢粮阴谋。不久又打退了敌伪的第二次进攻。这两次战斗我都亲身参加了。连续两次胜利，戈山厂民兵在这一带出了名。第三次戈山厂保卫战时，我已去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区委书记换上了魏璧轩同志。这次闻名全省的战斗，是在我主力三团攻克泗水城后的四四年底进行的。当时，七百多名日寇，两千多名汉奸，疯狂地围攻戈山厂。英勇的戈山厂人民奋起自卫抵抗，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我们付出了重大牺牲，终于打退了敌伪的进攻，取得了胜利。这次战斗大长了我军的志气，大灭了敌伪军的威风，受到了山东军区的表扬。山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的嘉奖令，登在当时的《大众日报》头版上，上面写着“向戈山厂人民致敬”八个大字。

一九四四年四月，建立了邹县县委，管辖曲泗县泗南、曲东南部及邹东。县委书记由杨士敬同志担任，组织部长窦长富，宣传部长燕遇明，民运部长赵群，敌工部长由我担任。当时，我带着日本反战同盟的山口正雄和朝鲜解放同盟的八个同志，向敌伪开展政治攻势，经过几次喊话，住在邹东魏庄的日寇一个小队撤往邹县县城。

一九四四年十月，我由邹县县委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我们提前毕业，我回到了鲁南一地委。第二次成立曲泗县委，从新四军七师调来了一位姓肖的同志任书记，我任副书记，刘海岩任组织部长，李健任宣传部长，刘鹏任民运部长，张瑞任妇救会主任，许仁安任县长，贾山任公安局长，刘道成任武装部长。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日，鲁南军区警八旅十五团解放曲阜，歼灭了汉奸大队，活捉了大队长尹庆木。曲泗县委于一九四六年元旦进入曲阜城。二月间，肖同志调走，四月间曲泗分开，从新四军七师调何泽洲任县委书记，我任副书记兼县长。五月间，何泽洲同志调走，我任县委书记兼县长。

一九四六年，曲阜县委成立后，抓了以下几件大事：第一，在上级领导下，为了巩固抗战成果，首先开展了反奸诉苦群众运动。主要打击了投降日寇、当了伪区、乡长的罪大恶极的汉奸头子和恶霸地主。

第二，进行了减租减息斗争。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县委组织了有六万农民参加的进

城大游行，对当地最大的封建势力衍圣公府进行了说理斗争。长期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农民，第一次享受到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的幸福。大家举着红旗，扛着杈把扫帚扬场锨，来到衍圣公府门前，向衍圣公府的代表孔雪光说理。孔雪光站在劳苦农民面前，连连答应同意减租减息。斗争了最大的封建势力衍圣公府，大大推动了全县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开展。

第三，为了开展对盘踞在兖州的国民党第五路军吴化文部的斗争，在坊岭、陵城两区成立了一个“兖州办公处”，李岩同志（长春地质学院党委书记，已逝世）任主任。办事处向驻兖州的蒋军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瓦解、削弱了敌军的战斗力。

第四，召开了孔子诞辰纪念会。曲阜解放后，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上造谣，污蔑攻击我党不要民族文化，不尊重历史，不尊重先贤。说共产党进曲阜城后，把孔庙、孔林的柏树都杀光了。为了反击国民党的诽谤，鲁南区党委决定，以曲阜县政府的名义，由我出面，召开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孔子诞辰纪念会。当时，省政府司法厅长张伯秋代表省政府讲了话，《大众日报》记者辛冠洁，为大会发了通讯报道。

第五，掀起了拥军支前高潮。一九四七年二月，莱芜战役打响后，曲阜县委发动全县人民踊跃支援我军作战，掀起了一个保卫胜利果实的支前高潮。当时，《大众日报》报道了曲阜人民踊跃支前消息。

一九四七年春，蒋介石发动了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国民党军整编十一师，全部美械装备的胡璉部，沿津浦铁路迅猛北上。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避其锋芒，减少不应有的损失，我们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准备撤退。当时，曲阜人民正满怀翻身解放的喜悦心情，迎接解放后的第一次小麦丰收。为了使广大干部群众不感到突然，县委分头向全县党员、干部、群众宣传了党中央的英明战略决策，使干部和群众心里有了实底，撤离时井井有条，留下的决心坚持斗争。然后，我们有计划地进行了战略撤退。先把县委、县政府机关撤退到东部靠近山区的大庙、高家村、胡二窑一带，接着动员家属向东转移。那时，我带着警卫员周长雨和机关的几个同志，住在离城一里的盛果寺。白天进城里安排工作，和城关区委书记庄正坤同志研究撤退后的事宜。直到敌人的先头部队快到南门时，我们才从北门走出。为了掩护后方和家属的撤退，尼山地委决定、并经鲁南区党委和军区批准，由曲阜独立营、泗水县大队，鲁南军区十六团二营，当即组成七十二团，任命十六团参谋长陈岩为团长、我为团政委，沿滋临公路边阻截，边撤退。到了汴桥，我们的阻击、掩护任务完成，十六团二营和泗水县大队归还了原建制，我便和贾山同志一起在泰泗宁边界的石莱、坊城、华村一带打游击。后来，到滨海休整。当时，鲁南专署副主任张劲夫同志也撤退到那里，帮助我们换了夏装，补充了枪支弹药，发了菜金和一部药品。我就又带着独立营二连，打回了鲁南来。那时，正是一九四七年八月间，敌人四十个团围攻鲁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泗水县委、邹县县委都随野战部队转到湖西去了。地委书记杨士法同志也带着一部分人，跟着野战军转移到鲁西，跟着刘、邓大军走了。当时代理尼山地委书记的是鲁南区党委组织部长魏思文，代理军分区司令员的是原军分区参谋长林毅。为了便于组织领导群众，对敌斗争，地委决定，我和留下来的邹县公安局长陈新同志，还有曲阜县公安局长贾山同志，组成邹泗曲县委，我任书记，陈新任县长，贾山任公安局长，活动在邹东、泗南、曲东一带。记得，敌人进攻邹东老区时，我带着独立营二连，当时只有二连，没有

一、三连。在邹东两天一夜连打五仗，白天在田黄一带打退敌人两次进攻，向莲青山转移时，在立石山消灭了伪乡公所；第二天又打退了邹县保安队和还乡团向颜家庄的进攻。我们这个由县委机关通讯员、公务员、交通员、炊事员等为主组成的年轻连队，好幾次打垮吴化文部“保五”、“保六”两个团对邹东、泗南的进攻，稳定了邹东、泗南的局势。邹县一区区委书记冯惠民、六区区委书记孔宪连，在这一时期的斗争中，成绩显著，冯惠民立了特等功，孔宪连立了一大功。邹县一部分干部回来后，我们便到曲泗一带打游击，我又任了曲泗县委书记。我带领的二连休整后，军装整齐崭新，人员年轻精神，武器装备精良。当我们路过营里、涝洼时，伪村长认为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到了，连忙齐集村头，吹着喇叭大号迎接。走近一看是解放军，吓得傻了眼，掉头就要跑。我们“因势利导”，喊住他们，吹着喇叭把我们迎进村里。接着，我们在泗水城附近活动了四、五天。泗水城的蒋匪军传说：山东兵团要来了，吓得弃城而逃。我们进城缴获了不少手榴弹和几百箱饼干。泗水县委回来后，我们把泗水城交给了他们，然后，带队西进，回到了我长期生活、工作、战斗的曲阜境内，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时，许世友、谭震林同志指挥的山东兵团来了。农历五月初四日攻克曲阜，“端午节”一大早，我带着连队，从白石桥赶来，由东门进了城，接收了曲阜战役的俘虏。曲阜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当时，上级为了表彰坚持敌后斗争的曲泗邹县委和曲阜独立营，由地委代理书记魏思文，军分区代理司令员林毅同志颁布命令，给曲泗邹县委和曲阜独立营各记大功一次。

曲阜第二次解放后，恢复了县委，周林同志仍任书记，王德生同志任县长，贾山同志任公安局长。当时，许、谭兵团继续西进，攻克兖州。曲阜人民在解放兖州的战斗中，作出了巨大贡献。据周林同志回忆，这一年最主要的是带领人民，修复了津浦铁路，支援了前线。周林同志接着说——

当时，鲁南区党委指示，要迅速修复津浦铁路，保证我军及时运送兵员和作战物资。当初为了阻止敌人的进攻，我们拆毁了铁路，现在为了进攻敌人，必须再把铁路修起来，而且要修得更好。但是，在当时要修复铁路，谈何容易！铁轨搬走了，枕木烧掉了，道钉、鱼鳞夹打了农具。既没有技术人员，又没有修路工具。据华东支前司令部负责同志讲，曾找了一个铁路工程师，征求修复铁路的意见，那个工程师说：别的不说，做枕木的木材都是从加拿大运来的“奎百克”红松木。那时，我们还没有夺取全国政权，对国外还没有联系，也没有外汇，就是有，加拿大也远在万里，而战争的需要迫在眉睫，修复铁路必须立即进行啊！县委连夜开会，层层发动群众，解决困难。第二次获得解放的曲阜人民，对共产党，对八路军更加热爱，支前的情绪十分高涨，劲头很大。人民发动起来了，有了办法，也有了物资。人们把埋在地下的铁轨扒了出来；没有修路工具和道钉，就发动全县铁匠炉自己打；没有枕木，就发动广大群众献木材，一根枕木，国家付给一百斤小米作报酬。统一了标准，发动全县木匠齐上阵。当时，曲阜境内、津浦铁路两旁，木匠一群群，红炉一盘盘，男女老少总动员，千百工匠齐献艺，干得热火朝天。华东野战军支前司令部的领导，到津浦铁路沿线视察，看到这样热烈动人的场面，十分称赞曲阜人民有智慧、有干劲。

（下转8页）

回忆第一次解放曲阜的攻城战

蒋 仰 乔

一九四五年隆冬，刚刚欢庆过日寇投降的鲁南人民，心中又笼罩上一层愁云——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日伪，抢占要地，妄图侵吞胜利果实。八年奋战的人民军队，根据党中央指示，征鞍未卸，立即投入了新的战斗。

曲阜，是闻名中外的文化古城，与军事重镇兖州毗邻。日伪保安团长尹庆木，妄图凭借坚固的城墙，率部千余人，气焰嚣张地抗拒人民军队的接收，坐待与国民党军队合流。当时鲁南军区首长当机立断，将消灭尹庆木解放曲阜县城的战斗任务，交给了警八旅十五团，林毅团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所在的一营。我和营长孙绍先接受任务后，便带领全营同志立即从邹县一带，开赴曲阜城南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

曲阜是我一别八年的故乡，这里的地形、民情我是熟悉的。为了使曲阜的珍贵文化遗产不受损害，使人民少遭战火之苦，我们营的几个同志认真研究上级指示，提出各种方案，最后决定“文武并举”，既做强攻的准备，又不放弃争取和平解放的努力。为此，全营指挥员在城周四关勘察地形，选择通道，侦察守敌活动规律，制定攻城方案，并进行临战训练。发动群众，绑扎云梯，广造攻城舆论，使守敌处于重兵压境、四面楚歌的惊恐之中。同时，又选派了一个勇敢机智的侦察员，化装入城，向尹庆木送交了劝降信函。土匪出身的尹庆木，虽然比较礼貌地接待了我们的送信人，但却顽固地拒绝向人民投降。在这种情况下，强攻就成了唯一可供选择的手段。

攻城的各项准备，扎扎实实地进行着。此时已近年关，尹庆木的保安团，由开始时的惊恐万状，渐渐又沉于醉生梦死，花天酒地，松懈起来，攻城条件日益成熟了。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的黄昏，风在呼呼地刮着，担任突击任务的一连，在连长张金声和指导员孙继成率领下，利用暮色掩护，乘守敌换岗吃饭的机会，隐避地向曲城西门运动，迅速控制了西门外的地域。营指挥所进驻西关酒店，营长孙绍先亲自到突击连指挥。当时全营仅有一个掷弹筒，一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全部进入了掩护阵地。晚上八时，战斗英雄排长孔祥坦，带领突击组直插城下。此时，城上守敌发觉情况异常，大声叫嚷：“注意啊，老八路来了！”顿时枪声齐鸣，弹雨如注。我掩护阵地枪炮开火，压制敌

人扫射，掩护突击组实施爆破。只听得“轰、轰、轰”三声巨响，厚厚的城门被轰开了，突击组勇猛突入城内，敌人被爆炸声吓昏，待其清醒过来时，我军已突入城门。

部队进城后，士气高涨，迅速扩大战果，分三路向前发展，一路直插城西北角，这里守敌较弱，不战自溃了。一路向正南门突击，守敌据险死守，战斗呈僵持状态，营指挥所分析情况后，决定率领部队穿过孔庙、鼓楼门，直插东门大街，分割城里敌人，占领敌指挥机关。部队插到敌指挥机关时，敌人早已逃散。就这样，我们的营指挥所便安置在东城门附近的孔家大院内。此时的东门，守敌聚集，火力较强，为了迟滞我军进攻，丧心病狂地烧起了东马道几间民房，火光使城上城下的敌人，对我们的行动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我攻城部队，争取时间，迅速集中火力。与城外担任佯攻任务的部队配合，两面夹击，使守敌腹背受敌。战斗英雄孔祥坦再次带领突击组突上甬道，几排手榴弹打得敌人昏头转向，不死即逃。

时间已过半夜，寒风凛冽刺骨，指战员们单薄的棉衣早为汗水浸透。但是战斗尚未结束，枪声又集中在正南门一带，我们的部队向那里紧压，缩小包围圈。正南门上下，堡垒坚固，敌人居高临下，四处退来的守敌，在尹庆木一个亲信营长指挥下，凭借碉堡负隅顽抗，战斗十分激烈。林毅团长率领三营也已赶到现场，为在实践中练兵，决定一营与三营任务交换，以三营主攻，一营佯攻牵制敌人，并且集中了进城部队的火器，压制敌人的疯狂射击，三营九连在火力掩护下，匍匐前进，发起强攻。突击组的战士一包炸药，把城墙下的敌碉堡炸飞，为攻城楼开出了通道。我军杀声震天，各边沿地堡的守敌，已无心抵抗，纷纷放弃碉堡逃命，九连战士乘胜尾追，占领了城楼制高点，活捉了顽敌营长，胜利结束了这一攻城战斗。

部队在胜利的欢呼声中打扫了战场。据报告，俘敌四百余人，缴获枪械三百余支，保安团长尹庆木妄图跳墙逃跑，跌伤在城下被我们活捉。

(上接6页)

人民解放军迅速向南挺进，准备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鲁南区党委批准我和刘剑同志(就是汪兴同志)，组成南下工作队鲁中南第四支队第十大队。刘剑同志任大队长，我任副大队长，带领滕县地委的四百余名干部随军南下。旧历年初，在锣鼓鞭炮声中，我们来到人民用心血修复的滕县火车站，乘车向华东局所在地临城进发。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哺育我们的山东人民，走上解放全中国的征途。……

访问结束时，周林同志紧紧握着我们的手，深情地说：“离开曲阜到现在，足足三十三年了。三十三年中，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曲阜也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我幼年读书在曲阜，在最艰苦的年代里，战斗、工作也是在曲阜，感谢曲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我一直想念曲阜，想念曲阜的人民群众！”最后，周林同志要我们代为转达对曲阜人民的问候！

第一次解放曲阜的点滴回忆

董鸣春 口述 孔祥民整理

〔董鸣春同志，是八路军鲁南军区警八旅十六团团长，曾带领部队参加第一次解放曲阜的攻城战斗。一九八一年四月访问他时，年已七旬，体弱多病，加上事隔三十六年，详细情节，实难追忆。但，董团长对调查采访史料，赋予极大热情，除作了如下回忆外，还提供了有关照片。〕

第一次解放曲阜，是鲁南军区警八旅十五团和十六团打的。当时我在十六团当团长。警八旅共有三个团，十八团没参加。在这之前，八师正布署打邹县和滕县，我们住在严马庄一带，准备打增援。后来，解放了邹县、滕县，八师就南下了。那时，我们只能打增援，还没打过攻坚战。因为，警八旅的三个团是日本鬼子投降后新编的。十五团是邹县、泗水县和赵博县三个县的独立营组建的，邹县独立营战斗力很强，十六团是费县和滕县独立营组建的。虽然干部都是有作战经验的老同志，但战士都没有经历过攻坚战的锻炼。

接受打曲阜的任务是在两下店。会上，旅部首长分析了当时的战局，那时兖州守敌较强，我们还没有打。先解放了曲阜，对解放兖州来说，将会大大鼓舞我军士气，孤立兖州守敌；同时，解放了曲阜也便于我军由东向西靠拢，免遭曲阜之敌的截击；再说，先打曲阜，在攻坚战术上也锻炼锻炼部队。旅部首长还特别强调注意保护孔庙、孔府等文物古迹。敌人如退守孔庙、孔府，只能短兵相接，不能打炮和使用炸药。当时，确定十五团打西门，作为主攻，据侦察得知，西门没有用土“围死”，两个南门和北门都不好打，我们十六团打东门，作为配合。

接受任务后，我和团政委万恩福同志带着部队，先到了曲阜城东南沿着一条大河的几个村子住下，有个村子叫河套。夜里，我带了营长和突击队长，摸到曲城东关看了地形。发现护城河水结了厚厚的冰，据群众反映，水深一米多，冰上攀不住大量部队通过，同时得知东门确已用沙土“围死”。经过侦察，我们一连作了四天准备。一面对战士进行忆苦教育，启发阶级觉悟，一面组织人力，扎了爬城用的梯子，过河用的梯板，准备了几十包炸药，组织了爆破队。同时，确定二营主攻，三营预备，一营组织火力掩护，并且进城后占领与保护孔庙、孔府。全团上下，士气高昂，求战心切，攻城战斗的时机已经成熟。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傍晚，按照旅部命令，我们带领部队，开始向曲城东关进发。在东关大街路北的一个群众院落里安了团指挥所。晚十点，我们团和打西门的十五团同时打响。我们团担任主攻的二营，在一、三营火力掩护下，很快靠近了东门。结果，爆破队连爆了几包炸药，东门并没能被炸开，发现门里囤土太多。因此，一面组织挖土，一面指挥梯子队，在东门以北攀登城墙。就这样，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才攻进东门，转入巷战。这时，十五团已提前半个多小时攻占了西门，也转入了巷战。巷战中，发现只有少数敌人串进孔庙，大量敌人退守正南门。因此，我团一营指战员搭人梯翻越庙墙，解决了逃进孔庙的敌人。这时，我们团和十五团的全部主力都转向正南门。敌人有一百五六十人死守，我们喊话，他们不理，非常顽固。我们派特务连与十五团配合，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掩护下，一气打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从东面爬上城墙。虽然伤亡二三十人，但全歼了死守的一百多名敌军。第二天（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全面结束了战斗。

三十一号这一天，打扫了战场，清点了俘虏和缴获的武器弹药。旅部首长表扬了我们两个团，说：“消灭了敌人，解放了曲阜，也保护了文物古迹。”一九四六年元旦，我们全团撤离了曲阜，接受了新的战斗任务。离开曲阜前，我们团部的同志和几个营长、教导员，还到孔庙大成门前照了一张相片（如图）作为纪念。

（后排中间为董鸣春同志）



回忆我少年时和孔德成在一起

张培英口述
张河整理

我母亲三十九岁进孔府，给孔德成当乳母。那年我八岁，也跟着母亲进了孔府。

我家住在曲阜城北、孔林后边的张羊村。民国九年阴历三月初六，不知为什么母亲和奶奶吵了理。母亲一生气，就领着我，随着出生四十一天的弟弟高哥了家。走到魏里累了，坐在孔府大门口歇了歇，正好碰上孔府的中医刘梦瀛，他见我母亲

很壮实，孩子吃得挺胖，就问我母亲愿不愿给小公爷当奶妈。母亲正赌气，觉得家里日子难过，就答应了。当时，孔德成出生才三个月，先后换了几个奶妈，都不行，吃了奶拉肚子，整天哭。我母亲试喂了两三天，很好，吃得很快，不哭不闹，也不拉肚子了。陶氏大喜，让母亲留在孔府。

把自己的孩子丢下，替别人奶孩子，母亲在气头上是答应了。可是几天之后就后悔了，我父亲也不愿意。但是母亲已经答应，当时孔府的旨意也难违抗，这样想来想去，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父亲才勉强同意立约，签字划押。字约上有这样的话：“公爷奶到十岁，老太太自有恩典”。还规定每天给我小弟弟一斤水面的馍馍和四两白糖，代替母亲的奶水。我母亲说：“德成虽是小公爷，可也是个苦孩子，出生几天，就死了亲娘。”母亲在孔府的头四年里，一直不能脱衣睡觉，夜里要喂三四次奶。几乎整天整夜守在陶氏的床前。在母亲奶孔德成开头几个月里，每天早晨，由厨房送给母亲一砂锅猪蹄，煮得很烂，可是不加盐，是很难下咽的，还有六个馍馍，两碗小米稀饭，做为早饭。每天中午吃陶氏她们剩下的汤菜和饭。陶氏每顿饭六菜一汤，总不断海米、海参、鸡蛋汤等。后来小公爷一天天长大，我也十几岁了，经常一块玩。我们在后堂楼和花厅里学唱戏，在花园里“藏毛毛”，踢毽子，跳绳，十分亲热。有时早晨我起床晚了，德成便拉着侍从去喊我，叫起来一块玩。

我弟弟张希玉和孔德成是同年，孔德成比我弟弟大几十天。那年孔德成和我弟弟同年结婚，孔德成早几天。德成夫人叫郭琪芳，和我弟弟也是同年。我弟弟结婚那天，德成和夫人一早就到我家贺喜。廖

加婚礼的人，看见小公爷来了，都向他们请安问好。德成在仆人面前，有时也很活泼，开个玩笑。他虽然是公爷，还是和小孩一样，一会说几句笑话，一会又躺在床上，笑着说：“躺躺新床一辈子不害腰疼。”他问新娘子你的脚怎么裹得这么小，花鞋怎么做得这样好看，是不是自己做的？他夫人不让他说这些话。他却说“这是在妈妈家里，她是咱嫂子，不要紧的。”那一天吃早饭的时候，德成和夫人回府，吃完饭又到我家。晚上，留他夫妇在我家吃饭，他就没有走。俺家做了四个好菜，破了旧例，他们夫妇和我弟弟在一桌吃了晚饭。他们边吃边谈，很高兴。他们夫妇在俺家过了一整天，很晚才回府去。

德成从婴儿到五岁断奶，与陶氏在一起的时间，不如和我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多。五岁以后不吃奶了，但一有空，就跑到后堂楼院我母亲住的下房里，喊着妈妈，围着我母亲转着玩。

那时母亲的住房旁有一个大厨房，是专给内宅的女佣人用的。每人一个锅灶，自己烧火做饭。象母亲这样的老仆人，每天能领到三斤柴禾。母亲经常做豆子咸糊粥喝。德成有时不吃小厨房给他做的鱼、肉、海参、鸡蛋，却要喝母亲做的豆子咸糊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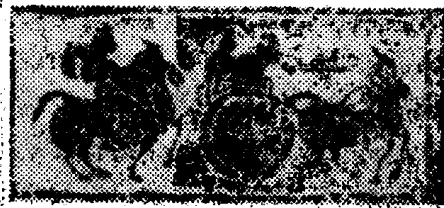
德成小时候很喜欢猫。陶氏住的前堂楼里一只大猫生了一只小猫，毛色纯白，很好看，德成要它，陶氏对母亲说“这只猫就归你喂了，要经心点。”母亲每天领半斤白面馍馍，再到厨房里记两个铜子的账，领些小鱼和猪下货等作猫食，母亲给这只猫领了十几年的食，小白猫喂成了大白猫。有一回，称了称十三斤多。德成十分喜爱这只猫，抱它，亲它，和它逗着玩，晚上还让它睡在自己的床上，给它起

了个名字叫“大白”。

后来，我家从张羊村搬到城里，就住在孔府后花园附近。我母亲因奶养公爷有功，陶氏赏给一个小菜园子，其实是一块荒着的坑洼地，也在后花园附近。那时德成正在西学念书。上学的空闲时间，经常叫侍从陪他出后花园，到我家小菜园附近散步、玩耍，父亲常常把刚摘下来的黄瓜给他尝鲜。

民国十九年，军阀混战，阎锡山的队伍打曲阜城，城内孔家十大府第的太太小姐都逃到孔府内宅避难，里外乱成一团。管事的，当差的，老妈子，丫环也都躲了起来。各顾各人，吃住困难。德成那年才十一岁，一个人躲在后堂楼。人们用土袋子、木板搭成了防弹棚，他就住在里面。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生活上得不到及时照料，我母亲时刻挂念着他，说：“孩子没娘，这个时候有谁管他的死活，”还是我母亲冒着炮火，烙了饼子，煮了咸鸡蛋，从小菜园里给他送进去。德成见了我母亲，象见了亲娘，抱着不让她离开。

一九四七年八月，德成从南京回家，临走前的那天晚上，到我们家看望母亲，他和母亲都哭了，当时他想带着母亲走。我们姐弟几个人哭着说“她老人家年岁大了，跟着你出去不方便”，这样才没把母亲带走。临行时，还给母亲留下了几件银器和衣物。我母亲活到八十岁，一九五九年病故。老人家临终时嘴里还不住地念叨着“小成来了，小成来了”！可见我母亲思念之情深呵。



跟随孔德成先生在南京

马贵法口述
张河整理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我由孔德成的随身侍从吴建章介绍到孔府当差。当时他领着我在前上房见了孔德成，孔德成对吴建章说：“叫他先到内宅门上去吧。”就这样，我开始算“见习当差。”

记得：这年十二月的一个夜晚，驻兖州国民党二十二师师长孙桐萱来到孔府，孔德成接他进去。他俩一向关系密切，据说换过帖。他俩边走边谈。孔德成问孙桐萱前方战事如何？孙回答说：“打了一个小小的败仗。”孙接着说：“到南京去玩玩吧！”孔回答说：“不行！还有家里她们。”孙说：“一块去！”孔德成把孙桐萱让到南花厅，招待他用饭。吃这顿饭的时间，孔德成接到韩复榘两次紧急电话催

他立即动身！

那天晚上，孔府上下象热锅上的蚂蚁，非常忙乱。孙带来的四个护兵，紧紧跟随孔德成，孔到后堂楼卧室与夫人孙琪芳一起收拾东西，护兵还叫他把窗帘统统去掉，死死地盯住卧室内，恐怕孔德成失踪。到了半夜多，孔德成坐上孙桐萱带来的汽车，离开了曲阜。

孔德成走后，八、九年没有信息。一九四六年五月，我和任庆生想出去打听一下孔德成的情况，于是到了南京。那时他还在重庆，我俩便先去南京和平门外义和东窑厂住下。直到九月初，才听说他已与全家坐飞机到了南京，就又去找他。我们走到和平门里，遇见他们夫妇和四个孩子。我向他说明来意，就叫我跟着他回到鄧郅路五号的临时公馆。那地方显得很荒凉，他们当时由重庆刚到南京才四、五天。房子是租的孔姓本家的，是一栋楼房的下层。我们进房间后，孔德成首先问到他乳母的情况，说：“张妈妈还壮实吗？”我回答说张妈妈还很壮实，他高兴地点了点头。在孔德成的住处我还见到了三七年跟着他去重庆的，他的随从吴建章和陈景荣等。当时，几位仆人都已是六十岁上下的老人了，都很思念家乡和亲人。只不过作为忠仆，才远离故土跟着小主人到处奔波。孔德成也曾说：想当初，离家南下，家庙无人奉祀，夫人有孕在身，也是故土难离啊。

有一天，孔德成夫妇邀我和任庆生步行到玄武湖，花了一万法币租船游了湖。还给我们每人一万法币在外面吃了饭。过了几天，他就叫任庆生留在临时公馆给他做饭。叫我到孔德成办事处当二友。当时，我俩的月薪都是四万法币，粮、油、煤都是配给，我俩算工友，每月只配给四斗大米，没有白面，他的老师、秘书等算

职员，配给就不同了。他们夫妇平时在临时公馆深居简出，衣食住行都比较俭朴。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要员、达官贵人都自顾不暇，没谁能想起他这个小“圣人”。孔德成青少年时期，外人求他写字是不难的。但在南京时，外人送去的宣纸积攒了很多，他一直不写，直到去台湾前夕才都烧掉。那时整日在公馆里闭门修养，偶尔也和我们说说家乡话。记得，伪国大开会期间，他开会回来，给我们讲他对那些勾心斗角的丑事非常反感。他平时吃饭很简单，每顿四个菜，做什么吃什么，从不挑剔。当时他的两个孩子在外面上学，有时吴建章去接他们。在琅琊路五号，他只招待过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当时国民党某些上层人物发动募捐修孔庙。他对这类事很不满意，曾对我们说：“他们这是拿着我的老祖打网捞钱的。”

那时，孔德成的办事处设在中华门西殷高巷12号刘鸿甫公馆的二楼上，外面连牌也没挂。办事处的组成是：办事处主任是他的老师、前清举人吕今山，秘书由他的私人秘书李炳南兼，管庶务的是他的夫人孙琪芳的表哥陈壮飞，会计是梅慕贤，后来去的他的乳师王毓华也算办事处职员，此外还有从重庆带去的厨师张同治。我平时侍候他的师爷们吃饭，每月还到伪内政部报销一次办公费用。有一次，我跟着梅会计到中央银行去领一个月的办公费，结果领了两面袋子钞票，其实并买不了多少东西。有一次，吕老师叫我去给他买大米，当时金元券四元买一斗，我嫌贵没买，第二天再买，上涨到六元，而且米店没米。最后中央票子更是一钱不值。梅会计曾给我一捆二、三斤重的中央票子，结果只换回来两包火柴。

孔德成在南京先后住过琅琊五号，桃园新村和四海里一号。有一次因有急事，

我在刘鸿甫公馆门口雇了一辆黄包车到桃园新村去找孔德成，他的大儿子孔维益见了我说：“你比我爸爸还阔哩！”在桃园新村，孔德成住二楼，两间算卧室，楼下只有一间会客室，一间餐室。他的老师吕今山住四楼。当时吕已近六十岁，一个老人无人照料，曾对我说：三七年冬，我们那几个人，叫谁来谁也不来，我家有老母，抛家舍业跟着孔德成去了重庆，一晃八年过去了，转眼就到了暮年。后来孔德成去了台湾，吕今山到苏州他教书的儿子吕庆堂家生活。但由于心情苦闷，不久就死了。

一九四七年八月，孔德成曾由南京坐火车回曲阜一趟，陈景荣、吴建章、任庆生等随行。途中在徐州车站停留时，被中央社记者缠住，问他对形势的看法，他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无可奉告。”

孔德成乘火车回南京途中，在浦口丢了一只箱子，内有北京太仆寺街的衍圣公府房权证明等重要文牒。

一九四八年冬，孔德成先让夫人和四个孩子及其随从去上海。同年末，他先携其长子与国民党兵团司令李延年同机从上海到台湾之后，他的夫人和三个孩子以及秘书李炳南等才离开上海。此时陈景荣、吴建章已先期由南京随船押运行李去了台湾。

孔德成离开南京后，我和任庆生又在四海里住了两个月，后来听说家乡已经解放，我俩才回到老家来。回顾三十多年前，在南京车站送孔德成赴上海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和任庆生都已六十多岁了，从内心里盼望着能在有生之年再与孔德成先生见上一面。

曲阜师范简史

高文浩

孔庙东侧，阙里街旁，有一座静謐的校园，大门上悬挂着郭沫若同志亲题的校牌。这就是历史悠久，负有盛名的山东省曲阜师范学校。

明末，现校址为都察院。清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公元一七一二年）改为学使校士馆，又称考院，即兖州府考试东棚。清末实行“预备立宪”，废科举，立新学，建师范。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公元一九〇五年），山东巡抚杨士骧飭将考院改办新式师范，“养成贤材以供朝廷之用”。额定学生一百名，次年正月开学。校名“曲阜县官立四氏初级完全师范学堂”。杨士骧奏明保荐孔子七十六世孙、钦命会同稽查全省学务、袭封“衍圣公”孔令貽为总理。举人孔昭曾（注一）为监督（校长）。是年秋，改任分省补用知府孔令誉为监督。次年，再改任杨跃林为监督。学堂章程，皆遵学部定章，“不得稍有歧异”。学制两种：完全科五年（予科一年，本科四年），简易科两年。招收高等小学毕业生（未毕业者，先入予科两年，俟毕业后升入本科）。每学年分上下两学期，上学期十八星期，下学期二十四星期，皆春季始业。课程分中、西学两种，计有国文、经学、修身、历史、地理、教育、博物、理化、算学、英文、图画等科。一九一一年后，先后加授单级教授法、二级教授法。完全科毕业，按成绩分为极、最优、优、中、下、最下六等，分别授予毕业、及格、修业文凭，作为师范科贡生，分任小学堂及程度相当之各项学堂正、副教员。简易科毕业，充任小学堂及程度相当之各项学堂副教员。完全科毕业生还可升入优级师范本科。此乃曲阜师范学校建校肇始。是时，虽名曰“官立”，实为孔府私有。事无小大，悉决于孔府。学生也仅为孔、颜、曾、孟四氏及其少数旁姓至亲子弟。因此，建校伊始，学校“规则严肃”，学生“谨守规矩勉力向学”、“绝无嚣张气息”。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公元一九〇八年）一月，因学生缺额甚多，又在曹、兖二府，济宁直隶州扩大招生。除四氏子弟外，“外姓聪敏子弟亦可取录就学”，以年三十以下，二十以上通经史学者，或中学明通者为合格。先由州县考取合格者四名，再由本校考取。新生按四氏及外姓分为内、外班，内班学生每月饭食费官支库平银二两，外班学生“自备资斧”。

宣统元年（己酉，公元一九〇九年），奉令停办师范简易科，一律办初级师范完全科，学制五年。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冬，随国体变更，校名更为“山东省立曲阜师范学校”。监督亦易名校长，取消总理名义，但实权仍执于孔府。然而，进步思潮毕竟不可遏抑，四氏子弟也非冥顽不化。伟大的辛亥革命，将民主潮流卷入这块窒息的校园。

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春，奉山东省长蔡志廉整顿学务令，与济宁道属之兖州、济宁、临沂、曹州四处师范合并，名“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孔子七十五世孙、曲阜文化名流孔祥桐任校长（注二），自是年始，学生来源突破“四氏”，吸收全省及邻省青少年入学。教员则一律以优级师范正科毕业生充当。此后数年，校舍增拓，管理加强，教育成绩斐然。毕业生以千计，“服务社会，莫不胜任”，“各县小学之选聘教员者，一言第二师校毕业生辄庆得人”。“又以附属小学为教生观摩所系，擘画又极精详，凡中外人士之莅校参观者，咸啧啧称道弗置”，被誉为“全国小学之冠”。（注三）

一九一八年，原曲阜县师范讲习所停办，由二师添设讲习科，以资弥补。

“五四”运动时，二师学生作为曲阜一带最先觉悟者，首起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之举，但遭到孔祥桐及孔府压制。学生们包围考棚楼，大闹校长室，严斥孔祥桐。学生们冲出学校，罢课游行，下乡宣传，成为曲阜反帝反封建的先锋。学潮激起轩然大波，数名學生被开除。孔祥桐被迫辞职出走。文化界坚主摆脱孔府，由教育家办学。终迫使北洋军阀政府任著名进步教育家范明枢（炳宸）为校长，一九二〇年春到任。二师由此摆脱孔府控制，使教育适应进步潮流，得以长足之发展。

范明枢一贯提倡学生爱国忧民、追求真理、研究政治、钻研业务，且戮力实践之。他制定了“真、善、美”三字校训。镌刻高悬于学校大门校名匾额之下，教育学生们以此为准则去生活、治学、做人；他在办公室悬挂亲书之“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与师生相砥砺，以天下为己任。他深入师生，改革教学，破除弊政，长校八年，校风巨变。有才学的教员延揽而至，康有为、梁启超等名流学者，纷来讲演。一九二三年，改革了学制，分为前后师，各三年毕业。改进了教学，建立学生会，创办专售进步书刊的《黎明书社》，班有墙报，校有专刊。新建礼堂，增辟荷池。灯前月下，池畔柳旁，学生们争相研究政治、钻求学业。除此，范校长还首倡并支持办起平民夜校，由学生任教员，招收当地工农群众三、四十人入校识字，其中包括七八名穷苦妇女，这在曲阜历史上为首次，并让夜校学生听时事讲演，启迪民心，培植社会进步力量。二师遂成为曲阜进步势力中心，因之渐有“红二师”之称。

“红二师”闻名遐迩，国共两党均予注意。据说，一九二二年，山东地区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王尽美曾派人来校开展工作。一九二五年，中共党组织又派杨荫鸿、张观成等来校活动；共产党员辛成智亦应聘为图书管理员。是年，此三人成了二师最早的党员。次年，曲阜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二师支部正式诞生，马守禹为负责人。

一九二四年夏始，国民党员在二师学生中亦日多。一九二五年七月，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成立。年底省党部直辖之曲阜区分部，首由二师学生胥可举在二师成立，党员三十人，大半为二师学生，数月内发展至八十余人，共产党员亦多以个人名义加入。乃成立曲阜临时县党部，假二师为活动机关，二师亦成为国民党在曲阜活动之中心。

这一时期，学生运动广泛深入开展。几年间，国内凡重大政治斗争，诸如“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北伐战争、各地工农斗争等，均在校内有迅速和强烈反映。

一九二七年，二师内一些国民党右翼分子日渐猖獗。他们公开提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煽动反苏反共。校内形势逐步恶化。张宗昌任命的教育厅长王寿彭又大搞复古，范明枢耻于俯就，愤而辞职，归籍种田。一九二八年初，一贯道头子郝书轩（希隆）任校长，秉承张宗昌旨意，镇压进步师生。是春，北伐军抵曲阜，郝被通缉，闻风而逃。

是年暑假后，北大毕业生、国民党进步人士宋还吾（锡珠）继任二师校长。宋曾参加“五四运动”和大革命，崇尚鲁迅。到任后，大力扶植进步力量。他带来及延聘的一批进步教师，如李灿培、蒋程久、陈登民、王祝晨、杨晦、陈翔鹤、岳一峰、丁月秋（女）等，予学生以良好影响。他任职一年余，进步力量复苏，局面又为之一新。

一九二八年济南“五三”惨案后，省立第一女师等学生大批集体转学至二师。从此，二师有了女生。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师演出新剧《子见南子》，触怒孔府，孔府控告二师校长宋还吾至国民政府教育部。孔祥熙极为震怒，蒋介石立命“严究”。虽有中外进步力量的声援，宋校长仍被撤职，学生会干部刘子衡、王宗佩等被开除。

一九二九年秋，学者张默生（敦訥）继任校长，学生闭门不纳，以示对当局镇压“子案”的抗议，致使张氏年底方来校，次年八月即称病辞职。

张默生莅任后，对进步活动却不加干涉限制，故这一年中，进步师生队伍仍有相当力量。教师楚图南还可以公开讲马列主义，批驳唯心主义；历史教员马非百仍可在大礼堂向全校学生讲辩证唯物论；新组织的学生会以《黎明书社》为基地，仍大量购入并带领大家阅读进步读物。

一九三〇年初冬，省教育厅督学主任、年仅二十六岁的张郁光（舒义）接任二师校长。他年轻激进，办学有方，治校一年，成绩卓著。他首先大力延揽进步而有真才实学的教师，组成一支以左翼教师为核心的教师队伍。如教务主任陆建平，教师任白戈、刘弄潮、郑韵涛（女）、潘希言、宋宪亭、肖寄语、尚莫宗、刘盼遂、傅烈、赵春珊、乌世漳、梁竹航等，都是德才兼备，对学生颇有影响。

一九三一年秋，学制改革，停招前师，只办后师三年，招考初中毕业生。自此始，学校规模一般为每届三班一百二十人（其中，经考试，单编一英文班），全校九班三百余人，课程分必修、选修两种。必修课有国文、公民、三民主义、社会学、伦理学、文学概论、三角、代数、几何、物理、化学、本国通史、外国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教育学、教育概论、行政管理、教学法、教育心理学、教育测验与统计、三段论法、体育等。一九三三年又添军体课、音乐、美术、劳作（又称手工）等。选修课有英语、文字学、国故概论、教育史、文学史等。每人可选三科。教材一般由省厅颁发，自然科学用外国教材。但张郁光任校长时期，文科教师往往在统编教材外，加添进步内容，或以自编教材取代。这时，教师大多倾向进步，富有真才实学。不少人且有学术著作，颇具名气。国内一些学者名流如徐志摩等，也时来讲学。故大批进步好学之青少年不远千里，跨省越府，慕名来此就学，遂致英才荟萃，进步空气日浓。一九三一年暑假后，中共二师支部重建，程照轩任书记。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张郁光支持下，二师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学生会及教务主任陆建平等与托派进行斗争，并带领学生抵制日货，上街演讲，下乡宣传，联络曲阜各界召开群众大会。同时联合兖州乡师、济宁七中、临沂乡师、曲阜明德中学等校